

● 中华金典百卷书

经济资源系列

84

中国当代 社会经济

丁一伟 贺耀敏

● 中国金典·经济资源系列



《中华全景百卷书》

编 委 会

顾问：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 苏 星

总编委会主任：李志坚

总编委会副主任：何卓新 孙向东

总 编 委：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 伟 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晓山 于振华 马艳平 王 红 王 伟

王 勉 王士平 王尔琪 王奇治 王品璋

王恩铭 王寅诚 王骊岭 石建英 卢云亭

田人隆 申先甲 刘 达 刘 彪 刘文彪

刘克明 刘树勇 刘振礼 刘俊华 刘峻骧

刘森财 成绶台 孙玉琴 孙彦判 邢东风

李元华 李明伟 吕品田 吕金陵 朱立南

朱祖希 朱筱新 朱莱茵 朱深深 伍国栋

华林甫 向世陵 杨菊花 吴舜龄 宋志明

宋剑霞 忻汝平 汪家兴 张 正 张亚立

张兆裕	张则正	张鹏志	陈晓莉	陈绶祥
陆道中	武 力	武玉宇	赵艳霞	罗静文
周 亮	周育德	金启凤	金奇康	金德年
金德厚	宗 时	空 宇	郑玉辉	郑进保
泽 昌	胡 洁	胡振宇	郝 旭	春 晖
钟 玉	郭文杰	郭积燕	郭素娟	袁济喜
夏继果	徐兆仁	徐庆全	钱 冶	浦善新
唐 忠	梁占军	涂新峰	黄同华	曹革成
蒋 超	葛晨虹	鲁 藏	焦国成	曾令真
谢 军	郭爱红	裴仁君	熊晓正	戴瑞丰

※ ※ ※

总策划·总编辑:朱新民

执行总编辑:傅亿仲

副总编辑: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

装帧设计:王 晖 尚云波

编辑人员:任白斌 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 徐庆全

主旋律的音符

(总 序)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主旋律”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而策划的。这是一套综合性强、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它由100卷分10个系列构成。在明理、知事、动情、养成的四个环节上，用100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用100个韵味浑厚的音符，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由100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建国45周年之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华全景百卷书》异彩纷呈，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古人云：知天下事，读五车书。

我们说：读百卷书，激爱国情！

序 言

20 世纪中叶以来,震惊整个世界的伟大变革在中国出现:新中国在暴风骤雨中诞生。中国人民终于第一次赢得了发展本国经济、建设强大国家的历史机遇和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数十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彻底摆脱贫困与落后、实现梦寐以求的富裕和繁荣,曾经前赴后继,血洒疆场;曾经万众一心,挥汗如雨。45 年的历史,是极不平凡的历史。

新中国的 45 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摧毁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其代理人,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并信心百倍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

新中国的 45 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依附,依靠亿万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

一、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

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就是在旧中国的一片废墟上开始建设气势宏伟的现代化大厦的。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幸和建国前后的严峻形势,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建设新中国是多么艰难的选择并需要多么艰苦的努力的啊!

1. 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没有出路

旧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借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和经济掠夺,中国经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伴随着这一残酷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也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生。从此,中国社会形成了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近代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极不合理、十分落后的经济结构。近代工业软弱无力，根本不能为改造传统经济和经济部门提供坚实有力的经济实力；传统经济部门特别是传统农业在实现工业化目标和寻求经济发展的重负下，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和掠夺下，几乎丧失了推动经济发展和贡献经济要素的能力。在这种严重畸变的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追求国家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必然是异常的艰难崎岖，是没有希望取得成功的。

（1）外国资本独享特权

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外国资本扮演着多重角色，即：它既是中国财富的掠夺者，又是工业文明的传播者；既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奇耻大辱，又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现代工业部门，仅有为数极少且基本上是从属于传统社会经济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急于开拓中国广大市场，外国资本大量涌入我国。在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主要投资于交通运输业、银行金融业、近代工业和房地产业；甲午战争后，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尤其是政治和军事借款、铁路和矿山投资、银行和金融投资、国际垄断资本的工业投

资急剧膨胀。外国在华资本 1894 年约为 1.19 亿美元, 1914 年增至 17 亿美元, 1930 年增至 33 亿美元, 1941 年达到 91 亿美元的高峰, 1948 年仍为 31 亿美元。

外国资本在华享有种种特权, 它们是西方列强刺入中国经济命脉的利剑。它们以各自本国的政府为依仗, 在中国为所欲为, 或借款给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小军阀, 控制政局并划分势力范围; 或投资于国民经济命脉部门, 垄断并独占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战略产业; 或称雄于中国市场, 排挤、打击和吞并中国资本企业。不彻底摆脱并改变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社会经济的局面, 就不可能改变中国经济的依附地位, 赢得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2) 中国资本曲折发展

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带动下也逐步发展起来。近代经济部门中的中国资本主要由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构成, 国家资本主要是由近代历届各级政府投资于近代经济部门而形成的资本形式, 私人资本则主要是由各种类型的个人投资于近代经济部门而形成的资本形式。国家资本居于有利的统治地位, 私人资本则长期受到外国资本和国家资本的制约与压制而处于不利地位。

国家资本以清政府洋务派开始创办近代军事

工业发端,到国民政府垮台之后国家资本被人民政府接管,前后经历了八、九十年的发展。在此期间一般的国家资本逐渐演变为垄断的国家资本,牢牢地控制着攸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据估算,国家资本 1894 年为 2796.6 万元,1913 年为 14887.5 万元,1920 年为 27091.8 万元,1936 年为 44100 万元,1949 年约为 51.2 亿元(折成 1936 年币值数)^①由于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私人资本在近代中国始终没有赢得正常和健康发展的机会和环境,而是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由于投资领域和行业受到多方面的严格限制,因而私人资本只能集中于面粉、纺织等轻工业部门以及商业活动中,在重工业等重要部门和行业则较少投资。据估计,私人资本 1894 年为 722.5 万元,1913 年为 15498.7 万元,1920 年 42987.4 万元,1936 年为 133500 万元,1949 年约为 8.03 亿元(折合成 1936 年币值)。虽说私人资本从资本总量上比国家资本多,但它没有成为中国资本主

^① 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义发展的主要力量,因而也不可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

(3) 传统经济深陷危机

中国近代的传统经济主要是传统农业经济。近代传统农业经济的严重危机主要表现为:第一,传统农业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并没有为传统农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反而使中国农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原料生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华北的殖民统治,以及所推行的“适地适户主义”,加速了“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格局的形成。第二,农业和农村中落后的经济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长期存在,已经成为束缚农业发展的桎梏,限制甚至窒息了近代农业的发展与变革。第三,传统农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日趋恶化,农村经济陷入停滞和萎缩状态。内部条件的恶化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装备很少改进、动力严重缺乏、经营方式落后与农业技术停滞、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生活条件恶化等;外部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为战争频繁、灾荒不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使农业和农民不仅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而且还处于极端动荡的环境之中。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表明,一国经

济现代化和工业化只有在该国农业取得一定发展并且能够为工业提供大量农业剩余及其他经济要素的时候,才会得到持久发展;反之,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就势必受挫而无法持续发展。中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经济,恰恰无力担当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任。

(4) 近代政府无所作为

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集团,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因为现代经济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为人们所自觉探求与指导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越是在后发展国家,人们所能参与的程度和所能发挥的作用越大。因为在这里,常规的发展秩序被颠倒了:它要求现代化的领导集团自上而下地摧毁旧秩序,并保证这种摧毁不致干扰和破坏新秩序的建立。充当这一角色的政治集团,一方面要运用各种力量来推进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约束自己的权力以在新秩序中确立自身的地位。中国近代社会一直没有出现符合这一要求的政府。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和资格承担此任。它们或是腐朽没落、不堪一击,或是追逐权力、鱼肉人民。近代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中国这样

的一个后发展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公正廉洁、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政治领导集团,中国的现代经济就难以成长和发展。

近代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2.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怎样选择?这不仅是中国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力量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努力探索的问题。形成于本世纪30、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道路的理论结晶,它为中国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早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就指出:必须要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

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①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继续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明确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5、678、6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1253、1255、1256页。

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分析了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明了中国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中，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基本经济纲领和方针是：第一，革命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中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第二，新民主主义是基本经济纲领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政策。第三，利用、限制和改造是中共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对内节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工作中的两个基本政策。第四，要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第五，实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七届二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人民革命建国纲

领”——《共同纲领》的基调。

应该看到,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早在1947年中国共产党就指出,落后的土地制度“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贫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土地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许多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并相继制定和颁布了包括《井冈山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土地改革的法令。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在全国4.75亿人口中,已有1.6亿人口的地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美国人韩丁曾说:1947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①不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些西方人,也把土地改革看作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秘密武器”。

① [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第7页。

3. 修复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在政治方面,虽然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许多地方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或正在建立,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些地方还没有解放;在经济方面,由于长期的贫困落后和连续12年战争的摧残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仍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一直在窥测时机,挑起事端,加紧对新中国进行政治渗透、军事恫吓和经济封锁。新中国能不能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中站稳脚跟,首先取决于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

薄一波在回忆当时的形势时这样写道:在新中国创立前后,我们“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建立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着手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稳定。这是我们党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到掌握全国政权过程中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我们失败,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我们的朋友中也有人对我们的治国能力表示怀疑,说共